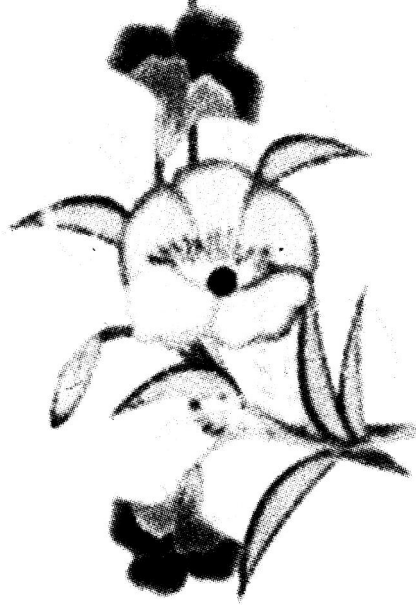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盲区结出的苦果





## 一、轰动北京的杀母案

### 与弑母死囚的最后对话

1998年3月28日13时许,北京一名19岁中学生朱宇在同学崔楠的帮助下,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磨碎后,骗母亲喝下,待母亲昏睡后,二人轮流用尼龙绳猛勒她的颈部,随后割破她的手腕放血,并在肢解尸体后将装尸的大包投入八一湖……

1999年4月21日,朱宇和他的同学崔楠同时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死刑之前,朱宇面对面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见到朱宇时,他正拖着一副沉甸甸的脚镣走进来,但看穿着,俨然还是个颇帅气的高中生,表情十分平静,使人难以相信面前的他就是那个手段残忍的凶犯。他坐在一个指定的座位上。

记者:听说你母亲对你很好,你怎么能忍心杀死她呢?

朱宇:我一直就对我母亲有抵触情绪。我父亲是因肝炎于1996年去世的。当时我听说肝炎还可以用其他医疗方法继续救治,但我妈怕花钱,没有用好药,说否则以后就没法过日子了。其实家里还有30多万元,而治疗只需20万元。我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我爸去世不久,有个男的

和我妈来往比较密切，经常来我家住，我对她愈发不满。

记者：还有其他原因吗？

朱宇：还有就是我女朋友的事，也不是恋人，就是好朋友的那种，我妈觉得是早恋，影响学习，我不这么认为。我妈过于重视学习成绩，对我很苛刻，让我必须考名牌大学，以此来控制我的行动自由、花钱等。有一次我的成绩落后了 3 名，开完家长会后，她连我放学回家都规定得那么清楚。如果出去必须时常给家里回电话，她接电话总问得特别仔细。我爸认为成绩比以前好就可以了。我妈不一样，她认为好是应该的，喜欢鸡蛋里挑骨头，为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我从心理上确实受不了。直到 3 月 25 日那天，因为我女朋友的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产生了很大分歧，我妈发了很大的火，说了一些很伤感情的话。在这之后我就有了那种想法。

记者：有了这种想法后，你用了多久来策划？毕竟你在一两天内完成了这些别人不可想象的步骤。

朱宇：一天。一天就可以考虑得很周密了。那天和母亲吵翻后，我就去找了崔楠，问他是否愿意帮忙，他答应一块儿干（其实朱宇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做准备的，他连续两天到档案馆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解剖学方面的书籍，接着在药店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种新的感冒冲剂）。

实施的过程就是我叫崔楠到我家，那是 3 月 28 日中午 1 点多钟。母亲不在，我给她打了个电话。等她回来后，我拿出感冒药，说她感冒了，这药是治感冒的，假装对她好。然后到厨房，把感冒冲剂与碾碎的镇定药一起冲化，再端回客厅，让我母亲喝下。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母亲觉得头晕，到里屋床上睡去了。我和崔楠就在客厅里等。半个小时后我们进去，在床边叫她，摇晃她，看她是否失去了知觉，可是没有。我们就又在客厅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再进去时，她的听觉没有了，但使劲摇还能摇晃醒。我们初步认定用绳子勒。我怕母亲看见我会挣扎，就让崔楠用塑料袋遮住她的眼睛。当时就这么实施了。

记者：你作案时想了些什么？没有觉得害怕吗？

朱宇：当时害怕是有的，但仅有一点点。当然也想过她是我母亲，我不能这样对待她。但转念一想，不这么做又不行。如果药劲过去，她醒了，首先会知道这件事，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她肯定会骂我，她还能给我好瞧的吗？她没死成，知道儿子杀她，你想，以后我在家里还怎么呆呀！我必须成功。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杀人的后果？

朱宇 被捕,我想过,可我觉得‘陷’不了,因为每个环节还是扣得比较紧密的。一是尸体上未留下指纹；二是尸体在家里未留下血迹；三是如果我不说，别人确定不了我的动机；四是即使尸体找着了，也不能说是我杀的。要不是当时犯懒，没把船划到岸上，往包里再加几块石头，尸体也不会浮上来。那样的话，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选择八一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紫竹院即将准备清淤，八一湖则是头两年刚清完的，短期内不会大动，是个沉尸的好地方。但尸体经过浸泡，7天后浮力相当大，必须往包里压砖头。另外大包的拉锁没全部拉上，留出一个小口，是为了让鱼虾钻进去，加速尸体的腐蚀。根据我国现在

的法律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有人失踪后，如果 3 年之内还找不到人，就按自然死亡处理了。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这些的？

朱宇：这些想法是平时积累的，我什么书都看（他谈这些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自豪的神情）。我知道用安眠药可以导致中枢神经麻痹，呼吸衰竭。说实话，我在班里成绩还行，跟同学关系普遍不错，又属于最老实的那类，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会这么做的。至于崔楠，他也够笨的。我 4 月 17 日折进来，但直到 8 月 15 日才把他揭发出来，在这 3 个月的时间里，他都能跑到蒙古去！自首也好，逃跑也好，总比坐以待毙好。

记者：对其他同学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朱宇：我想跟他们说的是，别去做违法的事。

我之所以这么狠心去做也并非偶然，这么长时间里我的苦衷根本没法说，说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对我的所为深恶痛绝，即使法庭判我死刑，我也不会上诉。但是我希望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把罪赎回来，为社会做点贡献。

朱宇最后的这段话，我不敢肯定它是否完全真实，他所说的那个“难言之隐”或许只是向法庭求生的最后希望。我问他：“如是现在，你还会这么做吗？”他脱口而出：“会！”这时他即将被带出房门，忽又停下来，回头冲我一乐，像个说漏嘴的小孩，改口说道：“不会。”在这张还略显稚气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对死亡的恐惧。一位法律工作者对记者说，现在很多刑事犯罪分子其实还是孩子，他们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死。那些小孩要是去刑场上走一遭，就明白死是什

么了，以后做事一定会记得有这个后果。

一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曾告诉朱宇，他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朱宇却说：“我杀的是我妈，是家里人，怎么会危害社会？”

朱宇(和崔楠)曾告诉记者，学校也讲过法律知识，但讲得不多。

## 姨妈谈外甥：朱宇是怎样一个人

“被告席上站着的是自己的外甥，死的是自己的妹妹，这份伤痛是外人无法体会的……更不能忍受的是朱宇在庭上撒谎，在他做过这一切后，非但至今无悔意，还玷污他妈的名节，这让我们无法接受。”朱宇的姨妈们痛心疾首地述说起往事。

她们说，朱宇的母亲在北京市水利机械施工处工作，父亲在一房地产公司工作。父亲去世后，其母受聘于该房地产公司。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从过去的困难生活中一起走过来的，感情一直很好。他父亲的肝病已有 20 多年了，因重度肝炎引起多脏器衰竭而去世。在他父亲去世前的 50 多天里，他母亲一直陪伴在病床前，用的都是最好的药品，对丈夫啥样儿大家都瞧在眼里。在这段时间里，朱宇却不曾主动到医院看望一下父亲，只知道给他母亲打电话要零用钱。他父亲去世的前几天还打电话让朱宇到医院，想和他谈谈。可第二天朱宇到时，他父亲已昏迷不醒，朱宇没呆 20 分钟就走了。

在朱宇父亲去世后，他母亲绝对没有让任何男人来家

住，家里条件也不容许，即使来人也只是为了谈工作。母子之间根本没有深仇大恨，真不明白朱宇为什么这样诋毁他妈。朱宇有什么要求，他妈都尽量满足他，朱宇对别人说：“我要做的事没有实现不了的！”有一次，为了能使家长不反对他和女朋友来往，竟假装昏倒，被送往医院救治，而他“犯病”绝不仅仅是这一回。

姨妈们说，朱宇从小就很聪明，学习也不错，特别爱看书，这也是大家喜欢他、宠他的原因。父母对他更是百依百顺，只要能考上大学，要什么给什么。朱宇对此很清楚，他知道怎样做就可以达到目的。他母亲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对长辈来说，认为朱宇已经失去父爱了，不能再让他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这种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使朱宇养成了自私自利、惟我独尊的个性。家人曾到他的学校了解情况，发现他在班上不合群，性格孤傲、自私，除了崔楠就没有一个朋友了。之所以跟崔楠好，是因为崔楠肯听他的。

他高一时成绩还好，高二时交了女朋友，成绩开始下降，也不想考大学。老师说他高三第一学期的成绩已很不好，照此下去考不上大学。

朱宇很看重钱，他的家庭环境很优越，他对物质上的要求比别的孩子高。他交女朋友后花销就越来越大。他母亲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让朱宇知道了她有钱。朱宇嘴上说考大学没问题，其实已打算开个台球厅，他妈当然不允许。他就想摆脱母亲的束缚，自由支配他妈的财产，而这个目的最终也达到了。当被拘留时，他身上还揣着他妈的 10 万元存单。然而好笑的是，朱宇想独立，却根本没有独立生



活的能力。在家里，他什么活儿都没干过。他母亲“失踪”后，他对过来陪住的姨妈说：“姨妈，麻烦您帮我把面拌上吧，以前都是我妈给拌的。”姨妈说：“面都做好了，你自己来拌吧。”而朱宇果真就拌得一塌糊涂。

姨妈们叹着气说，虽然朱宇的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可绝不是惟一的原因，因为社会是个大课堂，多元化的社会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消极因素不少。

据朱宇的另一位姨妈讲，去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她与朱宇家电话联系不上，感到奇怪。以为朱宇母亲或朱宇病了，于是在 29 日中午两点多，几个姨妈来到朱宇家。朱宇说母亲去山东了。姨妈们认为其母是很负责责任的，不会留下朱宇而不跟她们打招呼。姨妈们认为朱宇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当晚便留下来陪住。姨妈们想，就是去山东也不会不来电话。到晚上八点多，姨妈们坐不住了，要带朱宇去报案，朱宇不让。但姨妈们还是带朱宇到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报了案。其间朱宇的态度让姨妈们怀疑了：问他什么，他答非所问，还不着急。姨妈们都急哭了，他却一阵阵发呆，自言自语：“我会不会出事儿？我要不要写遗嘱？我都快崩溃了，怎么想我妈不应该失踪。为什么派出所不找我呀？”据此，姨妈们又到该派出所说了她们对朱宇的怀疑。派出所的干警问：“朱宇的牛仔裤换了没有？如果没换，想办法让他换下来，别洗！”因 29 日报案那天，他们看到朱宇裤腿的左膝盖处有印迹，但不敢肯定是血迹。姨妈们回去后观察朱宇的裤子，发现此处有洗过的泛黄印迹。

4 月 16 日，尸体从湖底漂上来，被八一湖巡湖者发现。海淀刑警大队闻讯到现场。当晚，公安人员到朱宇家取证，

并将在奶奶家的朱宇拘留。当天夜里朱宇交待了作案情况。

## 律师声称：朱宇有人格障碍

作为朱宇的辩护人，何桂深律师出示了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经调查的 1148 名北京初、高中学生里，有 14.3% 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和心理问题。虽然朱宇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成熟，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极不成熟。事实上朱宇具有严重的人格障碍，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何律师称，目前不少家长给予孩子的关心大多是物质和生活上的，很少注意他们心理上的变化和精神上的苦恼，以致孩子受到不健康思想的侵害，最终形成心理畸形。而朱宇正是由于父亲去世，高考紧张，和家長缺乏交流才走到这一步的。

对于处在青春期身体、心理发育都不成熟的孩子，不少家长用的是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中，家长的恋爱、再婚应该努力取得孩子的理解，注重自己的言行，以免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对孩子的早恋也应采取沟通引导的方式，不宜粗暴干涉，否则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同时司法部门和学校对青少年普及法制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课。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

## 崔楠是怎样被朱宇拉下水的

崔楠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模

样与朱宇聪明敏捷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看上去很憔悴，神情异常紧张，开口时竟有些结结巴巴。

记者：一开始你很反对朱宇杀母的这个想法，为什么后来又答应帮忙？

崔楠：朱宇和盘托出他的想法，令我大吃一惊。他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我觉得不可思议，劝他别那么做，危险太大。朱宇说，不帮忙就算了，他一个人干，让我别跟其他人说就行了。可我当时挺害怕的，感觉朱宇是那种凡是对他不利的都要予以铲除的人。他妈生他养他，就因管他太严，他就要杀他妈，我要是知道了这事，又不帮忙，一定会对我不利。何况我俩平时关系不错，就答应一块儿干了。

记者：你感觉朱宇是那样的人，又为何跟他交往？他在班里是怎样一个人？

崔楠：他在班上属于不合群的那种，没什么人缘。除理科外，其他功课成绩不太好。可他对我不错，我在班里也不太爱说话，但他什么话都对我说，我对他的印象挺好的，我们经常形影不离。

虽然那是他生母，可关系一直不好，朱宇说她妈对不起父亲，而且对他太苛刻，让他必须考名牌大学。

记者：实施当中你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过后果？事后有没有想过自首？

崔楠 我当时害怕极了，脑子都木了，一片空白，连他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见。之后半个多月，那情景还在我脑子里转，我没想到将来可能会死，觉得只是帮他分尸，不会判死刑的。事后，我什么都没跟家里说，我不敢说，我怕被抓起来，更怕家里人受不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知道总有一

天会被查出来的，可没地方逃跑，跑了也没法给家里一个交待。我非常后悔，我应该为我的所作所为负责。

记者：你觉得朱宇杀母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崔楠：我一直认为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很多教育手段都是错误的。孩子容易走两个极端，有的人特别孤僻，有的表现活泛，但活泛得过分了，而我就属于没事闷着头的那种。我跟父母倒是没什么矛盾，他们说的我都听，可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学习、兴趣、爱好等都应该关心。在家里一个人本来就与人交流少，又不是双胞胎，也不能对墙说啊。可有的家长不闻不问，就是一顿臭骂，这种教育方式是失败的。

##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就朱宇杀母一案，记者走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罗大华。

他认为，此案是当代国际国内青少年犯罪中很特殊的案件，但绝不是个别的，从中反映出家庭、学校、社会教育都存在很多问题。

目前不适宜的家庭教育可分为娇惯型、粗暴型、放任型、不轨型和矛盾型 5 类，其中娇惯型的占 20%。朱宇一案极为典型。由于家长在生活上对孩子过于娇宠，对其提出的各种物质要求百依百顺，导致孩子不愿过集体生活，经不起挫折考验，到社会上难以适应。特别是品格上的姑息迁就，造成孩子自私、任性、自由散漫。随着缺点、错误越来越多而得不到纠正，其潜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大。然而这些

问题却得不到家长的足够重视，他们仅片面地要求孩子的考试高分，认为这才是成龙之道，其它则可以忽略不计。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影响占到相当比重，但家长的总体素质不高，对孩子、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的生理、心理变化认识不足，未能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导致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据统计，处于十七八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心理变化最激烈，心理冲突最多。由于性别特征开始突出，孩子的成人感开始增强，由小学时挂在嘴边的“老师说的”；到中学时期的“我认为”；即由成人权威变为自我权威。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独立了，希望家长承认自己是成年人，尊重自己，在家里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然而成年人仍把他们当作孩子看待，严厉管教，任何事情都得跟家里说。对父母生活上的过多安排，中学生并不满意。由此产生情绪上的对立，认为家庭对其不理解。于是在同龄人中寻求理解和支持，有时因此出现了不良交友的情况。实际上他们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强，控制自己情绪、情感和行为的能力也较薄弱。容易产生两个极端：一方面经不起挫折，另一方面则盲目冒险，做出比较偏激的事情。朱宇一案便是如此。他认为，不能真正独立、掌握经济大权、交异性朋友的直接阻力来自家庭，简单地认为只要铲除母亲这个直接障碍，即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据统计，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的比重已占到70%以上，犯罪高峰为十七八岁，初次作案高峰为十五六岁，比以前大大提早。作案手段也趋于成人化，如涉及麻醉药、绳子等。此外还呈现出共同犯罪的特征，图财动机占据了主要地位。犯罪的低龄化、犯罪性质的严重化，这与时代

的特点有相当大的关联。现代社会是信息开放的社会，影视、光盘、录像、书刊大量传播，其中有不少充满暴力和淫秽内容。青少年好奇心强，模仿力较强，加上思维具有片面性，易产生偏激。在实践中得不到满足时，就予以模仿，实施报复。此时，家庭、学校、社会对其进行的道德与法制教育相形之下就显得异常薄弱了，大多停留在表面，比较空泛。此案中的朱宇如能从小被灌输尊重父母、长大报恩的思想，今天也不致如此。朱宇未能认识到杀母也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尚未形成法制观念，缺乏刑法方面的知识，只想自由自在，不考虑后果，这除了他本人的原因外，也说明法制教育的不足。

学校重视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德、智、体全面发展，结果也没能完全开发学生智力，造出一批高分低能儿。对于学习不好和表现不好导致成绩下降的所谓“双差生”，一些老师认为应该让他们受到淘汰，这实际上是把他们赶到社会上去了。教师中应提倡母爱精神，而现在的一些教师就缺乏这样的精神。学校是组织者，组织家庭、社会的力量共同来教育学生。一些教师很少对学生生活、心理上出现的问题寻根问底，请家长只为告一状，说家长没把学生教育好，把责任推给了家长。这些都导致教育中出现薄弱环节和漏洞。

至于朱宇的律师提到的“人格障碍”，从分析变态心理学来讲，称“反社会人格”，又称“病态人格”、“人格异常”、“个性异常”等。律师认为，有这种障碍的人，法律应对其减轻刑罚，其实不然。人格障碍并不等于患有精神病。有人格障碍的人也可能思维清晰，但在情感、情绪上难于适应正

常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是一种认知障碍，对问题的认识比较偏激，超出正常范围。这也反映出学校家庭教育方面的失误。

当前，家长、教师应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素质，进修青少年心理学，参加教育经验交流会，关注媒体上的相关专题节目，以掌握青少年特别是其青春过渡时期的心理规律，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林靖）

## 一个幸福家庭的毁灭

家长千方百计将孩子送进重点学校，福兮？祸兮？请看——

### 花季少女辞世前的呐喊

娜娜是个乖巧、文静的女孩子，回到家里总是把自己关进房间做自己的事，从不让父母操心。进入高中后，娜娜的脸上再难出现笑容，细心的妈妈曾一次又一次地和女儿交谈，鼓励她战胜眼前的困难，尽力而为。妈妈以为孩子是信任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事总是妈妈第一个知道。可这位母亲错了。这 3 封信便是明证。

#### 致 老 师

魏老师：您好！

好几次，我都想提起笔给您写这封信，可每次都犹豫，道(到)底要不要写，写给您会不会给您添麻烦……这一次，我终于还是鼓起了勇气。

我是您高一(1)班的学生娜娜，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自从我进高中以来，来到了这样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学校、班级；来到了这样一个太优



秀的学校、班级后，我越来越感到我似乎就是班上最差的，作为一个自费生，更加加剧了我的自悲心理我觉得我和班上任何一位同学都存在太大太大的差距，我仿佛觉得这样的优秀班级中，不该有我那么差的学生。在我以前的学校我基本都是班上的 12 名左右，可来到高中我一下子变成了我以前眼中那些差的无可救药的同学。特别是开学第一天，看着一位位口才极好的同学的自我介绍，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其实，我也想同他们一样上台去表达自己，可就因我是一名自费生，让我怎么也无法举起手来说“让我来”。

我发现我不再像初中一样拥有开朗而自信的性格了，虽然平时我与同学们有说有笑，可从开学到现在，我不知流过多少次泪！那种以前让我无法体会的差生的感觉仿佛让我今天一次尝了个够。刚开学时，有几次我经常会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个问题：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特别是下午放学回家的那段时间，原来很喜欢被已落山的太阳余下的金光照印（映）着的天空的我，如今看这时的天空也会觉得有一种荒凉的感觉。

从开学到现在，我的情绪波动总是很大，总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影响原来还可以的心情。有时我甚至觉得我根本不是上高中的料，如果当时填报志愿时，填个中专不是很好吗？

我的母亲也经常安慰，鼓励我，可我再也不愿